

雲夢縣志

第五輯

雲夢縣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封面题字：郑星楚

封面设计：易艾森

篆 刻：普金城

特约编辑：赵永宽

责任编辑：胡卫刚

校 对：黄为义 马家林

目 录

· 回 忆 录 ·

曲折的道路.....刘 非 (1)

· 中 华 儿 女 ·

舒赛在抗日时期被捕始末.....范 慧 (45)

舒赛小传.....舒铁民 (57)

· 丁 柄 权 史 料 ·

丁柄权将军传略.....胡卫刚 (61)

丁柄权在云梦领导的国民革命起义
.....盛廷干口述盛信澜整理 (64)

丁柄权回云梦招兵及同张群抗衡始末.....李世鹏 (71)

丁柄权任省保安处长的时候.....方 瞰 (78)

丁柄权与湖北保安第三团.....张子良 (86)

记襄河剿匪司令部的成立与溃散.....张子良 (90)

· 人 物 述 林 ·

我与彭克定先生.....方振新 (94)

夫君董惠将军传略.....兰慧君 (104)

先父冯绍韩先生小传.....冯家骏 (107)

· 史 海 钩 沉 ·

- 国大瑣记……………王义周 (109)
王义周与丁铮域竞选“国大代表”琐闻……………魏慕学 (128)
国民党云梦县机关的溃败和瓦解……………褚道元 (131)

· 文 苑 寻 芳 ·

依靠进步力量

- 我编武汉日报文艺副刊《鸛鵲洲》……………晏 明 (138)

· 海 外 乡 音 ·

- 家教与我的成长……………张良华 (149)

· 梦 泽 风 情 ·

- 过年过节的旧礼俗……………王义周 (152)
胡金店的孟兰大会……………盛信澜 (163)

· 补 充 · 订 正 · 更 正 ·

- 对《生祭陈恩普先生》的补充和订正…王学旦 王瑶阶 (173)
对《彭克定先生事略》的订正……………鲁 荃 (174)
《云梦文史资料》第四辑正误…………… (175)
政协云梦县第三届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名单…… (176)

曲折的道路

刘 非



刘非遗像

我今年已经六十五岁，半世蹉跎，愧疚良深。回顾以往所走过的道路，不禁百感交集。本文即系对自己前半生的片断记述。限于水平，错误失当之处，尚请批评指正。

一、踏入歧途

我出生于湖北云梦县西乡湾湖刘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培烈。父亲刘照涛十八岁时弃农从商，经人介绍到胡金店一家布庄当学徒，三年学徒期满，当了店员，为老板坐庄收布（农家手工纺织的棉布），同时在胡金店街上兼营杂货商店。经过十几年的经营，积攒了一些钱，在家乡购置了三石多田（大约二十多亩），修盖了一栋砖瓦平房，这是我家光景最好的年代。后来由于连年内战，城乡日益萧条，布庄时开时歇，我父亲经常处于半失业状态，杂货店也亏蚀关门了。一九三二年布庄由胡金店迁到云梦城里，在白布街继续开庄收布，我家也随之迁到城里居住，并在北街开了一个经营棉纱和染料的小店，但不到两年，布庄又停业了。自开的小

店因不善经营，也亏损日甚，几年间把购置的三石多田地几乎典尽卖光，当我读完小学时，家境已经破落不堪，无力供我升学读书了。

我六岁发蒙读私塾，先后从过刘余青和潘子健两位老师。一九三三年进云梦县立中心小学，插班三年级，读了一个学期，以成绩突出获许跳越四年级而升读五年级。一九三五年小学毕业时，与王敬槐同为九十八分并列第一名。这里有一段趣话。我读六年级时，湖北省教育厅制发一种“模范儿童奖章”，发给云梦六枚，县里的两所小学（中心小学和私立培英小学）各分三枚，由各校挑选德业俱优的学生发给之。我们中心小学发奖的那天，县长王兰塘来到学校，他对由学校挑选站在前排的十几名候选学生看了又看，忽然跑到最后排六年级学生中把我叫了出来，问校长张天健：“这个学生怎么样？”校长说：“他成绩很好，就是太淘气！”王兰塘一听笑了，还是将我拉到前排，把一枚奖章发给了我，另两枚发给了龚翔鹏和熊云仙（女）。过了几个月，他来校参加我们的毕业典礼，见我榜列第一名，又找着我逗趣地说：

“你淘气也是第一名吧！”

在我的童年时代，对于小学毕业后能上中学念书，看作是一件令人非常羡慕的事情。那时候我们云梦全县只有两所小学，根本没有中学，邻县应城有一所私立“西河初级中学”，孝感有一所私立“求实女子初级中学”，班级都不完全，至多只能容纳两百多个学生，而且每个学期都须交付学费好几十元，在当时这是一个不小的负担。省立中学不收学费，只交膳食、服装、书籍费，负担较轻，但全省只有十几所。云梦邻近地区只在安陆设有一所中学，即省立第十中学，每年招考一次新生，每次录取四十名，备取十名，合计五十名，成为安陆、云梦、应城、孝感、应山、礼山（大悟）等好几个县的每届小学毕业生竞相报考的唯一目标。家境宽裕的可以去武汉升学，但不是一般学生所能办到

的。我小学毕业后，眼看着别人或去安陆或去武汉升中学，我连安陆也去不起，心里多么难受！而父母则指望我从此能够作事挣钱，减轻家里的生活担子，于是央求别人给我在黄陂税务稽征所找到一份差事。我不得已去到黄陂，人家一看我是个十五岁的孩子，不想要，叫我回去。我诉说家里为了送我来，给我做衣服，制被子，筹路费，花了好几块钱，这又回去，可怎么好啊！这个稽征所的主任把我再打量了一下，叫我写几个字给他看看，又问我会不会打算盘。末了，他便让我留下来，指定我住在传达室里，担任文件收发登记和传达工作，每月工资十元，除了吃伙食，还余下六、七元，我十分满意。可是只干了一个月，稽征所的主任换了人，新来的主任把我辞退了，我只得卷起铺盖，和在小学同班毕业的同学吴庆三（他在黄陂县中念书，这时放暑假）结伴回到了云梦。父母见我失业归来，又是责怪，又是难过，只好让我在家里呆着，又去托人另想办法。第二年夏季，云梦有二十几个人要去安陆报考十中，我按捺不住，想去试试。父母原不同意，但到底还是给了两元钱我作路费，而我竟然一去就考取了（这次云梦被录取的有关疏若、关忠森、张振国和我共四人）。这就给我家里增添了忧愁：让我上学去吧，拿不出钱来，不让我去吧，又觉得太可惜；母亲为此流出了眼泪，但还是决心让我去上学，叫我去向一位亲戚挪借二、三十元钱交费用。那位亲戚在困难的时候，我家曾经帮助过他，目前的景况较好。殊不料我在说明来意之后，他却板起面孔说：“没有钱就不读嘛，我那有钱借？”这不啻当头一棒，我心里一阵凉，转身就走；坐在一边的另一位亲长见了觉得不大好，她赶到路上把我拉住，递给我二十元钱。这样，我才去安陆进了十中。但是家里也只勉强维持我读了一年，实在无法继续负担下去，第二年，我又被迫失学了。从此，我即无缘再攀学校的大门，我的学生时代就这样匆匆结束了。

正当我因失学而徬徨苦闷的时候，“七七”抗日战争爆发

了。当时国共合作，团结御侮，全民族敌汽同仇，抗战浪潮汹涌澎湃；尤其是青年人，热血沸腾，纷纷请缨杀敌。这种形势深深感染和鼓舞了我，使我感到投笔从戎是我应走的道路，也是唯一的出路，乃决心离开云梦去到田家镇——那是长江中游湖北境内的江防要塞，有一个团的部队驻守，我有一位姓方的远房表兄在这个团的医务所当主任。同他见面以后，他要我在医务所当看护，我感到这个工作于我不适合，而他又无法给我别的工作，当兵又不够年龄，结果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回到家里，父母埋怨白花了路费，有些人还一旁笑话、奚落，使我这个年方十六岁的少年，不只又承受了一次失学失业的打击，并在幼稚的心灵里，深深刻下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社会印记！好不容易又熬过了几个月，在快要过农历年的时候，我那位姓方的远亲探亲回来了，说他们那个部队已经调到武昌驻防，将要成立政工大队和卫生大队，需要有知识的青年，如愿意去，他可以负责介绍。在我听来这是一个莫大的喜讯，和我同样处境的几个朋友也感到有了希望，决定和我一起去，方某也一口应允。于是春节一过（一九三八年二月），我就和王敬槐、左俊及另一位姓左的朋友（左侔的胞弟，忘其名），兴致勃勃地由云梦去到武昌珞珈山附近那个部队的驻地，找到了方某。可是万没有料到，他这时已经被撤职了，他自顾不暇，对我们自然无能为力；并且又听说政工大队也暂不成立，我们的希望完全落空了。我们来的时候，都只带了少量路费，如今两手空空，住食无着，何去何从，茫然不知所措；约莫过了六、七天，我们便吃了上顿愁下顿，过了今天愁明天。怎么办？四个人只得各打主意。左俊决意回云梦，他先走了；另一位姓左的朋友决定就留在那个部队的医务所；剩下我和王敬槐，既不想回到云梦，又没有别的去处，就暂时借住在武昌粮道街云梦同乡会。

王敬槐是云梦东乡人，大我两岁，小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

武昌职业学校化工科，读了一年，也是由于接济困难而中途辍学。在流落武汉的这段日子里，我两个同宿一张床，同盖一条被，或徘徊街头，或寻访亲友，形影不离，艰难与共。有一次，两人手中一文不名，他带着我去向一位家住武昌的职业学校的同学借钱吃饭，这位同学很慷慨，立即借给了三元钱，一走出门，他便风趣的说：“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敬槐同学就是这样诙谐乐观，在困难的时候也不灰心丧气，加之他聪颖好学，热情开朗，所以同学们都乐于和他交往。时间很快到了夏天，保卫大武汉正进入高潮。一天傍晚，我两个漫步蛇山黄鹤矶头，凭栏远眺，只见浩浩江流，滚滚东去，而我两个却仍然徬徨无所趋向，不禁感慨系之！他愤然地说：“大丈夫应一往直前，我是决不回去的，你意如何？”我说，如果回去，一旦云梦沦陷，不当汉奸，也得当亡国奴，决不能干。于是相约再分途去想办法。过了几天，当时在湖北省会警察局工作的我的一位族叔刘余青为我弄到了一张高中毕业的假证明书（刘非这个名字，就是刘余青为我填写假证明时代起的），介绍我去报考战干团。在考取之前，也凭这张假证明书，临时介绍我到警察局去当书记员（抄写文件的司书），以维持生活。与此同时，王敬槐也打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在武汉招生，并找到了设在汉口的报名登记处。他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说登记处对前往报名的青年非常热情，邀请我一起去报名。我由于工作已经有了着落，战干团又近在武汉，就不愿意远去延安，打算投考战干团；而王敬槐则决心去报考抗大。临分手那天，他没有什么行李，我把印有“湖北省立第十中学”的一条旧床单包着他的几件衣袜，向别人借了两元钱给他作零花，一直送到汉口日租界抗大招生接待处，依依而别。几个月后，还曾收到过他从延安寄给我的一封信，告知他已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以后就音讯隔绝，以迄至今。

送别王敬槐以后，我就去到武昌湖北省会警察局第二分局作

了书记员。十月武汉沦陷，省会警察局改编为湖北省警卫总队，我又随这个部队撤退到鄂西，于第二年（一九三九年）才辗转去到四川綦江投考战干团，从此陷进了国民党的反动营垒，不能自拔。一念之差，终生饮恨！

二、綦江阴霾

战干团是国民党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开办的一所大型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全名称叫“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创立，其宗旨主要是训练部队政治工作干部，同时也搞民训（民众组训）、军训（学生军训）以及部队军事干部的训练。共设四个团，均由蒋介石兼任团长，陈诚任副团长，而又分别专设教育长实际负责。第一团原设武昌，后迁四川綦江，教育长桂永清。第二团设山西，实际未成立。第三团设江西零都，教育长唐冠英。第四团设西安，教育长先后为胡宗南、蒋坚忍。第一团原设有军事、民训、军训、政训四个科，有三个学生总队，一个学员总队（调训在职的部队和军事机关干部），一个直属女生大队。第三期以后，专设一个政训科，停止招收女生，学员总队和直属女生大队均撤销，另成立一个直属军事队。

我是于一九三九年九月从鄂西建始步行入川，经奉节、万县、重庆，去到綦江投考第一团第五期政训科的。在等待发榜期间，遇见了两位云梦青年，都是中心小学的同学，一是郭祥照，改名郭杆，已在第二期受训毕业，此时在战干团政治部忠诚剧团当演员；另一位是杨舜星，刚从第四期毕业，正在等待分配工作。远游遇乡亲，都显得亲切、高兴。我考取后，即在该团第三总队第二大队第七中队受训。

綦江是邻近重庆的一个县城，仅有一条大街，战干团团本部即驻在这里。第一总队驻广兴场，第二总队尚未接收新生，第三

总队驻江津县属之五福场，直属军事队驻綦江三角镇。所有各队均系借用农村较宽大的房舍为营房，以中队为单位分散进行训练。正规训练时间为六个月，前三个月为入伍训练，主要为操场制式教练和野外教练，开设兵器、地形、筑城、谍报、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游击战术等课程。后三个月为分科训练，以政训科来说，主要是上政治课，有“总理遗教”、“三民主义哲学体系”、“总裁言行”（又叫“领袖言行”）、“政治学概论”“经济学概论”、“国际形势”、“地理”、“新闻学”、“民众组训”、“军民合作”、“对敌宣传”等等。还有不定期的“精神讲话”，请国民党军政要人和各界名流专题演讲，蒋介石、陈诚都来讲过话。陈诚在一次讲话中有过这样一句话：“北伐靠黄埔，抗战靠战团。”这句话在战干团师生中广为流传，自夸自豪。事实上这句话是离谱太远了。不过这句话却也说明了两个情况：一是蒋介石于开办战干团的同时，宣布撤销“复兴社”，建立“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这一撤一建，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件大事，说明蒋介石对以黄埔学生为基干的“复兴社”是失望了，感到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代替，而以战干团学生为基干的“三青团”，即是蒋介石心目中的这一新的力量。二是陈诚自始就把战干团看作是自己的势力范围，对战干团学生故示宠爱，在学生之中已经形成一种观念：除了蒋介石就是陈诚。这两个情况充分说明当年蒋介石、陈诚确实都是把战干团看作自己的政治资产而抱有很大野心的。

战干团各期学生在受训期间，无例外的都要加入三青团和国民党，都是以总队（或直属大队）为单位集体宣誓加入，先入团，后入党，分别举行仪式。但加入以后，并不过党团组织生活，也没有什么要求和活动，规定毕业分配工作以后要缴党费，但不缴也没有人过问。

战干团没有团歌，与中央军校一样唱黄埔军校校歌，表示继

承黄埔系统和黄埔精神。战干团撤销以后，其各期毕业学生的学籍也并入军校。

战干团是在国共合作、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时代背景下成立的。因此，在开办之初，在武汉训练期间，全团官生在团结抗战的伟大旗帜下，目标一致，上下无间，虽大敌当前而对抗战必胜充满信心，虽战局紧张而精神极为振奋，显得朝气蓬勃，颇有生气。这可以说是战干团最兴旺的时期。但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以后，抗战进入了更艰苦的阶段，日寇加紧了对蒋介石的逼和诱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逆流随之而起。一九三九年，湖南、河北、山东、鄂东、皖南等地相继发生的“磨擦”事件层出不穷，《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已在国民党内部传达执行。战干团的政治气候也明显地发生了变化，并且越演越烈，卒至把一个训练团变成了囚禁青年的集中营，用残杀代替训练，震惊中外的“綦江惨案”发生了，数以百计的无辜青年被加以共产党罪名而惨遭屠杀。

惨案是一九四〇年六月由第三总队第二大队开始的，迅即遍及全总队。紧接着第一总队（第六期）和驻在綦江的忠诚剧团也随之而动，一时整个綦江城腥风血雨，阴霾蔽天，处在一片恐怖之中。但是世上没有不漏风的墙，同年八、九月间，惨案的情况已为外间所知晓，民主人士周鲸文在香港出版的一本杂志（名称忘记）以《綦江集中营》为题将惨案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举世震动，舆论大哗，纷纷要求惩凶。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也出面要求追究。蒋介石乃不得不着令重庆卫戍总司令部调查处理（綦江在卫戍区内），并将教育长桂永清撤职，而调任驻德武官，将第三总队的三个大队长杨天威、张少泉、曾传庆交付军法审判，形式上判了刑，但关押不久便都释放了。而两个总队长肖劲（第三总队）、杨厚采（第一总队）却逍遥法外。后来，肖劲还当上了军长，杨厚采也当上了海军陆战

队总司令。可叹那许多被残杀的青年，抗战报国有什么罪，却招来杀身横祸，冤沉海底，抱恨终天！我当时是身历其境的一个受训学生，兹就我的亲见亲闻，把惨案的情况（仅个人了解的一角）记述如下：

（一）惨案发生前的几种迹象

惨案的发生，决非偶然。根据事前的一些迹象，充分说明是发动于上层，有预谋、有步骤地干出来的。迹象之一，是颠倒黑白，大造反共舆论。一九三九年开始攻击共产党八路军“游而不击”、“封建割据”、“袭击国军”、“不服从军令政令”等等诬蔑之词，即在全团到处泛滥；精神讲话和小组讨论都是以这些为内容，把各地磨擦的责任加诸共产党。政治部主任滕杰在一次精神讲话中大讲所谓“内患不除，外患不已”，重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老调。迹象之二，是血口喷人，掀起反共嚎叫。战干团编造了一个所谓“枪杀黄埔，活埋战团”的无稽谎言。说凡是中央军校和战干团毕业的学生，共产党最为仇恨，一旦落到共产党手里，不是枪毙就是活埋。还捏造了一些所谓事例，叫嚣对共产党只能是你死我活，决无并存的可能，用这种谣言来造成学生仇共恐共的心理。迹象之三，是歪曲孙中山三大政策，为反共制造根据。一九四〇年夏天的一天下午，第三总队全体官生集合于总队大操场，宣布讲解孙中山（当时称孙总理）

“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总队长肖劲及所有教官都参加了，由总队指导员郑涛主持讲解。他们事先已做好了三个两米见方的大木牌子，用毛笔分别写上容、溶、熔三个大字，竖立在主席台上。郑涛一个牌子一个牌子地指着说：“孙总理所说的容不是容纳的容，也不是三点水的溶，而是火旁熔，是熔化共产党于国民党，不许可保留共产党的组织和活动。”他们无耻地污蔑说，是共产党篡改了这个熔字，是共产党企图利用三大政策以颠覆国民党。现在看来，战干团的这种怪论未免太可笑了，而当

时却居然就是这样自欺欺人。

（二）捕风捉影，枉加罪名

战干团的学生，绝大多数是家乡被日寇侵占的流亡青年，没有家庭接济。也有些家在大后方云南、贵州、四川的，还有一些华侨学生，有家庭补助，手头比较充裕，逢到节假日上街，顺便请同学坐坐茶馆，吃点小食，本属人情之常，却不料这些生活上的来往，在惨案中竟被说成是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平日比较活跃，比较出众的学生，多被列为怀疑对象。我们第七队首先被逮捕的学生杨霞村，就是一位很活泼能干的同学。第六队有两位华侨学生，是文娱活动的积极分子，长于口琴演奏，也因此而被怀疑逮捕。一九四〇年元旦，桂永清来到第三总队主持第五期开学典礼，在总队广场大演话剧，一连三天，很是热闹。团政治部借此开展了一次征文比赛，全团官生均可参加，结果第十二中队学生李洪的《大地在沸腾》一文被评为第一名，由战干团主办的《力行》月刊全文发表。这是一篇报导文学，描写开学典礼的盛况。谁会想到，在惨案中这位同学竟因此而丢掉了性命。其罪名据说就是因为他的文章“是共产党的笔调”。

（三）严刑逼供，广为株连

一天上午，我们正在上课，大队长张少泉带着警卫来到第七队。不一会，本队指导员胡寿昌来到课堂将一个四川籍学生杨霞村叫去，十几分钟后从队长室传来张少泉的咆哮和杨霞村的惨叫声。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到午饭时，杨霞村的手被捆绑着，鼻青脸肿，面部流血，由两个卫兵从队长室架出，押往后面地下室去。

这天下午，正常的操课停止，中队长邓一飞集合全队学生讲话。他说：“你们之中有共产党捣乱，要进行暴动。为了你们的安全，现在宣布两项命令：一，除各班班长之外（班长又称分队长，也是学生），其余各人的子弹一律交出；二，从现在起，

所有学生非经许可，不准离开本队范围，否则以抗命论处。”后来我们了解到，象杨霞村突然被捕和命令学生交出子弹这样的事，其他各队也都在同时进行。我们第七队这天被捕的只有杨霞村一人，其他的队人数多少不等。从这时起，全部学生实际已被软禁，大规模的逮捕正在开始。

当天夜晚，我们刚入睡不久，即被一阵阵的骚动声所惊醒，听到急骤的脚步声来来去去，仿佛来了不少的人；也听到一些低沉的谈话声，但听不清说些什么。我们躺在铺上暗暗以手推碰，相互示意，谁也不敢出声。不久，我们第三队区队长林国球进入寝室，用电筒将我们察看一遍。他命令三个班长起床，持枪同他站在门口，然后大声向我们说：“大家注意听着，待会叫到谁的名字谁就起来，没有叫到的不准起床，不准乱动。”说完，他点燃室内油灯，吩咐三个班长看守，然后走了。我们心情紧张，都担心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不久，从队长室断断续续传来问话声，接着又听到张少泉的叫骂声，也听到拍桌子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吊打和被打人的惨叫声，这种恐怖的声音通宵达旦，一直没有停歇。到快天亮时，轮到了我们第三区队，接连叫去了好几个人。我正害怕叫到我，林国球就已经在叫我的名字了。我赶忙穿上衣服，跟着他走进队长室。大队长张少泉坐在办公桌前，桌上放着一个手摇电话机（原先没有的），机旁接着一根三、四米长的电线。队长邓一飞和指导员胡寿昌站在张的背后，还有几个武装卫兵站在两边。屋子里梁柱上悬着一根长吊绳，地上摆着棍棒等刑具。沿墙边歪歪斜斜倒着十来个被捆绑的学生，都在痛苦地呻吟着。我和几个被叫去的同学站在桌子前面。张少泉满脸杀气，一个挨一个问我们的姓名、年龄、籍贯等等，俨然审讯犯人一般。他还提出一些人名来问，我们都不知道，不认识。这时，邓一飞向张少泉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可能是说天快亮了，学生将起床了。张就厉声向我们说：“你们这些小鬼，共产党三个字压都可

以把你们压死，以后可不要和别人乱搞，下去吧！”我们懵里懵懂回到寝室，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起床以后，我看到被捆绑的学生并不全是我们第七队的，第五、第六和第八队的都有。本队昨夜有多少人受到审讯，起初谁也不敢说，慢慢地才一个一个讲出来。全队一百二十多人，被叫去审讯的超过半数。先被叫去的，有的遭到吊打，有的受过电刑。审讯的方式和过程几乎是一律的，即根据前一人所说（严刑下的被迫胡说），追查所牵连的人。有的被讯问回答不上来，只得将上茶馆、进饭馆、一起吃过花生糖果等琐事说了出来，而这些就被认作秘密开会和串连，便追问开会的内容与阴谋，如果说不出所以然来，就吊打和用电刑。据一个受过电刑的同学说：卫兵将电线的一头触在他的手腕上，大队长张少泉摇动电话机，他就感到五脏崩裂，全身皮肉象撕开一样剧痛，被多摇几次就神志不清，形同半死。我见到关押在第七队的一个学生（各队被逮捕的学生分散交换关押，被认为最重要的关押在大队部），不过二十岁，因受电刑已经双目失明，他整日自言自语，时哭时笑，其状甚惨！在这种严刑逼供下，为了少受痛苦，只好胡说，因此株连甚广，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四）搞假暴动，制造藉口

大逮捕开始以后，有一天队长又集合全队宣布：“共产党在加紧捣乱，大家要特别小心，无论发生什么情况，要注意听我的哨音，哨音一响，都要就地卧下不动，谁要是违抗，就地格杀。”一天，两天，三天过去了，并没有什么动静，不料第四天晚上，意外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这天晚上九点钟，我们刚下自习，照例在院中等待集合点名，忽然远处传来了枪声。大家正在惊疑之际，队长的哨音已经吹响，我们赶紧趴在地上。这时灯火熄灭，室里室外漆黑一团，枪声则愈来愈密，越来越近，本队四周忽亦枪声陡起，子弹在头

顶上空呼啸飞过，历久不息。队长、指导员和三个区队长，在室内用电筒四处照射，察看我们有没有动静，一面大声喊道：“共产党暴动，正在同保卫你们的部队激战。”约莫一小时后，枪声渐稀，终于停止。队长集合学生点名，一无缺少。他宣布：“共产党的暴动已被我们平息，现在你们可以安心去睡吧！”

第二天，各大队的学生奉命全部出动，对驻地周围的老百姓进行大搜查，煞有介事地说是要肃清共产党埋伏下来的暴动分子。实际这不过是骗人的花招。不久之后，这个所谓“共产党暴动”之谜，在学生中已暗暗揭穿了。据那晚参加过“平息暴动”的第三班班长翁立楚和第七班班长张亚夫对我说，这是总队长和三个大队长玩出来的鬼把戏。他们预定这天晚上来一次全总队的预防演习，事先由各队队长向各班班长作了秘密布置，当总队部的枪声一响，各大队各中队同时响应。在各队学生听到队长哨音一齐卧倒在地上时，各班班长就持枪跑出室外，在本队周围对空鸣枪射击。因此，那天晚上，以总队部为中心，周围十二个队约二十里方圆的地区里，一片枪声，宛同战场。老百姓在睡梦中被惊醒，莫不饱受虚惊。

（五）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一天下午，我们全队学生集合在操场上休息，两个武装卫兵押解着杨霞村到大队部去，从大家跟前经过，指导员胡寿昌忽然大声喊道：“杨霞村要离开我们了，大家该送送去。”他的话音刚落，人群中有人接着喊打，一声吆喝，一、二十人凶猛向前，拳足交加，把杨村霞打得半死，倒在路边水沟里。这分明是事先作好的布置，而胡寿昌却装作好人出来解围，将杨霞村从水沟里拉起来交警卫带走。

又有一天晚饭之后，天近黄昏，大队长张少泉集合第七、第八两队学生在第八队的操场上训话，对共产党大肆污蔑。最后他说：“你们当中就有共产党，现在还想捣乱，我把他们叫出来你